

水 滸 傳

施耐庵 羅貫中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施耐庵
罗贯中 著

水 滸 傳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北京

鲁迅论《水浒》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前 言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全书贯穿一个主导思想：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因此最后接受招安。它虽然以农民起义为题材，却从根本上歪曲了农民的革命斗争，实质上是反对农民革命，适应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

十二世纪初期，在北宋王朝反动腐朽的统治下，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大约与江南地区方腊起义同时，北方爆发了宋江起义。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活动范围约在今河北、山东、河南、江苏一带地方，直接威胁着北宋都城汴京，影响很大。有关这次起义的故事一直广泛流传，并逐步形成戏剧与小说。在这一流传过程中，封建统治阶级对宋江起义故事不断加工和改造，注入反动思想。到了元末明初，《水浒》已经成书。小说《水浒》中，宋江已被精心塑造成为一个投降派的典型；作品通过对他的美化、歌颂，来达到鼓吹投降主义的罪恶目的。

《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是从否定晁盖及其革命路线开始的。“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宋江上梁山以前，晁盖领导梁山起义军实行的正是一条反抗地主阶级统治、发展农民革命的路线。

晁盖和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等人从夺取封建统治者的“不义之财”开始，走上革命道路。大名府留守梁中书将“十万贯金珠宝贝玩器”，送去京城向太师蔡京祝寿。“自幼飘荡江湖”的刘唐得知这个消息，立即报与晁盖，准备中途夺取。他们响亮地提出了“不义之财，取之何碍”的口号。为了组织力量，吴用又去联络石碣村的阮氏三兄弟。阮氏兄弟是渔民，备受官府“科差”的剥削和各种敲榨勒索，终年辛勤劳动，生活却十分困苦，心头积压着反抗剥削压迫的怒火，他们羡慕梁山泊里“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的起义者，早已“几遍商量要去入伙”。一经吴用联络，他们便积极地参加了晁盖主持的“智取生辰纲”的正义斗争。这一革命行动，蔑弃了封建王朝的“法度”，必然引起封建官府的疯狂镇压。在封建统治者的镇压面前，晁盖放火烧毁了自己的庄院，同吴用、阮氏兄弟等率领石碣村渔民，勇敢地歼灭了前来“剿捕”他们的官军，大灭了反动统治者的威风。他们把捉来的官军头目何涛割去双耳，教他传话给济州知府：“俺这石碣村阮氏三雄、东溪村天王晁盖，都不是好撩拨的！”便是太师蔡京亲自来，也要“搠他三二十个透明的窟窿”。这是公开向封建政权宣战，显示了起义农民英勇反抗的雄伟气魄。最后，晁盖决心造反到底，带领一群革命者上了梁山。晁盖做了梁山领袖后，便宣布“各人务要竭力同心，共聚大义”。晁盖的“聚义”，就是在梁山上

建立起农民革命的武装割据政权，与北宋王朝势不两立。他们“每日只是操练人兵，准备拒敌官军”。在大败济州府“征剿”梁山的反革命部队、俘获团练使黄安之后，梁山上更是积极“屯粮，造船，制办军器，安排寨栅、城垣，添造房屋，整顿衣袍、铠甲，打造枪、刀、弓、箭”，跟朝廷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晁盖的领导下，梁山的一些普通头领也具有反抗封建王朝、反对皇帝的革命思想。朱贵在梁山酒店里捉住戴宗，拆了九江知府送给太师蔡京的信。戴宗呵斥他：“把太师府书信擅开拆，毁了封皮，却该甚罪！”他蔑视地笑着说：“休说拆开了太师府书札，便有利害，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

然而，《水浒》是反对晁盖这条革命路线的。作品在许多地方渲染晁盖等人只是贪图“一套富贵”，希求“一世快活”，诬蔑具有反抗精神的阮氏兄弟“能生横祸，善降非灾”，并通过宋江的口，用“造反有罪”的反动谬论来贬斥晁盖等人的革命行动。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把封建统治者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血汗夺回来，宋江说这是“犯了迷天之罪”。及至晁盖等人抗击封建王朝的武装镇压，打得官军落花流水，最后上了梁山，宋江又认为这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

《水浒》为要进一步否定晁盖在梁山上实行的革命路线，特意安排晁盖中箭身死。原来在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和《大宋宣和遗事》中，晁盖都在三十六人以内。而《水浒》却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无论三十六天罡，还是七十二地煞，都没有了晁盖的位置。书中说得十分清楚：“在晁盖恐托胆称

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所谓“托胆称王”就是指晁盖蔑视皇权，敢于对抗封建王朝，所以一定要他“归天及早”；而宋江“尽忠报国”，“呼群保义”，能把梁山义军引向投降，于是就让他“把寨为头”。

《水浒》排斥晁盖，抬出宋江作为梁山义军的领袖，完全是为了宣传投降主义路线的需要。宋江根本不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而是混进农民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满脑子“忠孝节义”的孔孟之徒，一心维护封建政权，只想依附封建统治势力博取高官厚禄。他从来仇视“犯上作乱”，自己更是绝无造反要求。在他看来，造反上山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他杀了阎婆惜，外出逃难，只有贵族柴进的门下，花荣的官军营寨，孔明的地主庄园，才是他心目中的安身之处，唯独不想投奔在梁山的晁盖。后来只是由于“名又不成，功又不就”，满腹牢骚，误题“反诗”，在江州问斩，梁山好汉劫了法场，一时走投无路，这才“勉从虎穴暂栖身”，上了梁山。

宋江是一个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阶级分子，他自始至终竭诚拥戴宋朝皇帝，同封建统治没有任何利害冲突。仅仅由于地主阶级内部的互相倾轧，在所谓“奸邪”的排挤下，使得他“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没能“做得大事业”，因而同高俅、蔡京一伙不断发生冲突。他们之间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有一种观点认为宋江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双重性格，其实宋江这个投降派从来没有革命性。他一贯忠于皇帝、忠于封建王朝，上山之前反对农民革命，上

山之后又从内部破坏农民革命，他有的只是死心塌地维护封建统治的地主阶级反动性。

宋江的上山，不过是“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早在他上山之前，就曾对要上二龙山入伙的武松说：“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撞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一番劝导武松的贴心话，正表明他一生要走的道路和追求的目标。上山之后，他就用这种地主阶级反动的世界观来改造农民起义队伍，逐步篡夺山寨的领导权。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他全然无视晁盖的领袖地位，山寨的人事安排和重大决策，往往只由他一人做主，以致从四面八方来投奔梁山的人，只知有“及时雨”，不知有晁天王。从大闹江州以后，梁山义军打祝家庄、高唐州、青州、华州等几次重大战役，都由宋江统率军马，晁盖只是担负着看守山寨的任务。每当晁盖表示要亲自下山时，宋江总是说“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表面上爱护晁盖，其实是有意把晁盖架空，树立自己的威信，为篡夺领导权积累资本。等到晁盖在曾头市中箭身死，宋江便水到渠成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尽管宋江身穿重孝，“比似丧考妣一般，哭得发昏”，并在正厅上香花供奉起“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实际上却偷天换日，大搞修正主义，全面篡改了晁盖坚持与封建统治者斗争到底的纲领和路线。

就在宋江当了梁山领袖的当天，第一件事便是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正是把农民坚持斗争的起义路线篡改成

效忠于地主阶级的投降路线的一个严重步骤和明显标志。从此，这条投降主义路线便在梁山起义队伍中公开化、合法化了。“义”是有阶级内容的。“聚义”的“义”就是通常说的农民起义的“义”，就是农民群众团结起来反抗封建统治。而宋江所提倡的“忠义”，则篡改了晁盖“聚义”的内容，只有追随他效忠于皇帝和朝廷才算做“义”。这个“忠义”正是他用来束缚农民起义军手脚的精神枷锁，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武器。

宋江篡权成功，“替天行道”便正式成为他在梁山大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一面旗帜。“替天行道”是什么货色？作者借九天玄女的口告诫宋江：“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所谓“天”，就是封建王朝及其最高代表皇帝的象征，神权和君权的统一；所谓“道”，就是“全忠仗义”、“辅国安民”，即用以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孔孟之道。要想“替天行道”，就必须“去邪归正”，走接受招安的投降道路。显然，宋江向人吹嘘的“替天行道”，不过是叛卖农民革命，替宋王朝效犬马之劳而已。

就这样，宋江身在梁山，干的是宋王朝代理人的勾当，全面篡改了梁山起义的目标、性质、纲领、路线，取消了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把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纳入了地主阶级的轨道，彻底葬送了梁山的农民革命事业。宋江在梁山的全部活动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受招安。

为了受招安，宋江大造投降舆论。梁山泊排座次时，他公然声称“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在菊花会上，又明目张胆地鼓吹“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这种投降论

调，他不厌其烦，逢人便讲，成了口头禅。他竭力贩卖孔孟之道，宣扬奴才哲学。在一百〇八人歃血为盟的誓言中，塞进“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的黑货；他宣称造反是“逆天”，而把投降说成是“顺天”，就是要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奴才道德，消灭起义军的革命思想，为投降铺平道路。

为了受招安，宋江千方百计把极端仇视农民起义的富豪将吏拉上山寨，加强以他为首的投降派的领导班子与骨干力量。卢俊义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这个大名府的富豪在经过梁山时，竟准备下一袋麻绳，狂妄地要单人独马捉尽梁山好汉。被俘之后，又坚决不肯“入伙”，声称“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就是这样一个反动透顶的家伙，宋江却认为他文能安邦，武能附众，“他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尽生光彩”，一句话，卢俊义具有带领梁山起义军投降的“品德”和“才干”，所以，不惜花费一千两黄金，动用数千兵马，把他弄上山来。从此，宋江有了一个推行投降路线的得力助手。

为了受招安，宋江竟用军事斗争与朝廷进行政治交易。他也会带兵攻高唐州，闹华阴县，打大名府，但决不是要扩大根据地，夺取宋室天下。正如宋江一伙供认的那样：“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贪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宋江也曾抵抗过前来“征剿”的官军，但对那些带兵的反动将领却是百般宽容、优待，为来日招安留下后路；仗败溃逃的，不准追歼；捉住的，“亲解其缚”，“纳头便拜”，口称“死罪”，倾吐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的衷曲。

宋江的“打”与“抗”只是姿态，“和”与“降”才是本质。“打”是为了“和”，“抗”是为了“降”。

为了受招安，宋江不择手段地与朝廷牵线搭桥。他不仅和所谓“忠臣”宿元景很早就拉上了关系，而且还向他视为奸邪的高俅卑躬屈膝，乞求招安。高俅被捉上梁山，宋江一见，慌忙扶上堂来，跪拜在地，并大摆了三天酒宴，馈赠了数千金礼物，然后毕恭毕敬送出山寨，“专等招安消息”。他甚至亲自出马，溜进东京，走皇帝的宠妓李师师的后门，想通过“枕头上关节”，讨到皇帝招安的赦书。

对于宋江这一系列卑鄙的叛卖行径，《水浒》的作者自始至终采取歌颂的态度。他把宋江一味要做奴才的“忠义”思想，渲染成大义凛然的崇高品德；把屈膝投降说成是“去邪归正”；把接受招安说成是“终成正果”；而且用浓墨重彩描画招安时的场面：“从梁山泊直抵济州地面，扎缚起二十四座山棚”，“结采悬花”，“鼓乐喧天”，“异香缭绕”，这个葬送农民革命的灾难时刻竟成了盛大的节日。作者高唱“一封恩诏出明光，伫看梁山尽束装”的赞歌，鼓吹投降的反动面目暴露得何等清楚！

宋江的投降活动，引起了革命派的强烈不满和抵制。就在那一次菊花会上，宋江用《满江红》词鼓吹招安，立即遭到反对。李逵忿激地说：“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一脚把桌子踢起，摔个粉碎。在宋王朝的几次招安活动中，阮小七目无天子换御酒，李逵撕毁诏书骂徽宗，吴用则指责宋江对招安太“执迷”了。但是，领导权不掌握在革命派手里，宋江利用他篡夺的权力，软硬兼施，以反革命两手镇压革命派。他经常说什么

“情分最重”，讲什么“死生相托”，企图用这条绳索把大家拴在他的指挥棒上；如果有人不把宋朝皇帝放在眼里，坚持要把农民起义的事业进行到底，他就凶相毕露。李逵反对招安，宋江立即要把他推出斩首，只是由于众人讲情，才寄下“项上一刀”，“再犯，必不轻恕”。这一切说明，梁山起义军的失败，完全是由于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而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他们是不愿投降的。

必须指出，与热情地歌颂宋江的投降路线相反，作者对于革命派反招安的正义立场是否定的。在作品中，宋江的投降路线始终占着统治地位，李逵等人的反投降路线只处于陪衬的地位。革命派的每次反抗行动，作者都要抬出宋江的“忠义”压下去，并且让他们最后都跟着宋江去受招安，征方腊，抹煞了他们的革命性，对革命派的形象作了严重歪曲。

在《水浒》的评论中，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论调，把宋江的投降说成是“农民的历史局限性”。这是把宋江的地主阶级的反动本性强加在农民头上，是对农民阶级的诬蔑。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广大农民曾多次地举行起义，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和先进的政党，他们不可能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从斗争的结局上说，总不免陷于失败。但是，通过斗争，总是打击了封建统治，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叛变投降，则是放弃了斗争，适应地主阶级维护反动统治的需要，怎么能将这二者混为一谈呢？把斗争不屈而失败和为了升官发财而投降说成是一

回事，就抹煞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坚持起义的路线和坚持投降的路线的原则界限，是不折不扣的阶级调和论。

投降派的发展规律，必然是从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叛卖活动，到直接充当反动统治阶级的鹰犬；从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到赤裸裸地执行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路线。**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公然打起“顺天”、“护国”的旗帜，死心塌地顺皇帝的旨意，去护地主阶级之国了。宋江主动讨到“圣旨”，“部领兵马前去征剿”方腊起义军，咬牙切齿地发誓：如不“诛尽杀绝，誓不回兵”，穷凶极恶地屠杀革命人民，把他们“割腹剜心”。这同他在梁山上对待官军将士的态度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投降派宋江就这样踏着起义农民的尸骨爬上“安抚使”的官位，用造反者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锦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宋江其人则是革命人民的一个反面教员。但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关于《水浒》的许多评论，几乎都违背了鲁迅的正确论述。不少文章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实质上是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这是必须加以讨论和澄清的。我社原先采取金圣叹删去二十多回的本子作整理出版的底本，多次印行，长期未能认识到问题的关键和要害，不是把《水浒》作为反面教材，而是当作进步作品，加以传播，这也是原则性的错误，同样需要澄清，以肃清不良影响。

建国初期，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时，毛主席就指出，象武训那样的人，“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毛主席还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毛主席的这些深刻的分析，对我们研究和评论《水浒》同样具有指导意义。我们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不仅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而且对于文学、哲学、历史、教育各个领域，对于我们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水浒》成书于元末明初。作者相传不一，有的说是施耐庵，有的说是罗贯中，有的说是施作罗编。从明代中叶开始，《水浒》大量翻刻、流行。目前见到的最早刻本，是明嘉靖年间代定侯郭勋刻的百回本，残存数回。现存较早的百回本是明万历年间刻的天都外臣序本。稍后的容与堂刻本，就是以这个本子作为底本的。百回本的后半部从宋江叛卖农民革命得

逞，写到他替宋王朝去征辽和征方腊。据推测，这比较接近《水浒》原本。万历末年，杨定见刊刻的百二十回本，是在百回本的基础上加入了征田虎、王庆的故事。明中叶以后，《水浒》不断印行，出现许多版本，尽管繁简不同，回目、正文、情节略有差异，但都载有宋江投降活动的全过程。

明末，反动文人金圣叹把百回本砍掉二十多回，删去排座次以后受招安、征方腊等情节，加进一段自己编造的“惊恶梦”，作为结尾，成为七十回本（加“楔子”实为七十一回）。当时封建统治者对如火如荼的农民革命斗争反复采用“招抚”和“征剿”两手，金圣叹删改《水浒》，不许宋江一伙受招安，要把梁山一百〇八人“一齐处斩”，这正是地主阶级梦想依靠血腥屠杀的一手来消灭农民起义的反动策略思想的表现。但是，无论是政治欺骗，还是军事镇压，都不能挽救反动统治阶级灭亡的命运。只是《水浒》经金圣叹这么一砍，宋江这个投降派的面目不能充分暴露出来，就不真实了。鲁迅对金圣叹非常不满，认为金本失去了“原作的诚实之处”，把它比作“断尾巴蜻蜓”。

这次印行的百回本是根据明代容与堂刻本校勘标点的，七十一回本是根据本社一九五四年整理本重排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七五年九月

关于本书的校点说明

一百回本《水浒传》，包括了宋江受招安和投降以后打方腊的情节，是比较接近《水浒》原貌的一个本子。我们加以校点印行，为广大读者提供反面教材。

本书采用的底本，是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末年（一六一〇年左右）杭州容与堂刻本。原书一百卷一百回，题为《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书前有四篇评论文字，正文有眉批、行间夹批和回末总评，还附有插图。这个版本没有署作者姓名。

有关本书的校点工作，说明如下：

一、本书定名为《水浒传》，并根据其他刻本，署撰写者为施耐庵、罗贯中。

二、删去底本书前附加的评论文字以及书中的评语、插图和卷次字样。

三、底本部分书页的文字有湮漫残缺，根据北京图书馆和文学研究所收藏的两种容与堂刻本的残本以及明万历年间天都外臣序本校补。

四、底本明显的错夺衍误文字，参照一百回天都外臣序本，一百二十回杨定见序本等加以订正。对各本均误的文字，

除显系刻误的错别字酌予改正外，其余仍保留原状。

五、底本有不少词语，前后用字不一致，校点时对意思完全相同而用字过于混乱的词语，酌加统一，一般仍保留原书的歧异。

六、本书采用简化字排版，个别有歧义、易误解的字，仍用繁体。

本书的校订及标点、分段，一定有不妥以至错误的地方，恳望广大读者指正。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七五年九月